

批《三字经》

北京大学 哲军 翟仲 史群

人民教育出版社

32,287
171
3

批《三字经》

北京大学 哲军 翟仲 史群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

1974年9月第一版 197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40,000 册

大 32开 100,000 册

书号 2012·05 定价 0.08 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出版者的话

《三字经》是宣扬孔孟之道的害人经，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他们的奴才和接班人而编写的，对劳动人民毒害也很大。在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长期用作启蒙课本，流毒广，影响深，必须彻底批判。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各地中小学革命师生，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向工农兵学习，奋笔批判《三字经》之类的坏书，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形势一派大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使广大革命儿童和青少年从小就能粗知一些马列主义，敢于批判孔老二，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锻炼成长，这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有重大意义。

《批〈三字经〉》的出版，希望能够对中小学教师提供一些参考，对中小学批判《三字经》有所帮助。收入本书的《批〈三字经〉》和《〈三字经〉批注》两篇文章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四期），收入本书的时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订。

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在编辑出版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师生批评指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九月

批《三字经》

北京大学 哲 军

《三字经》是一本宣扬孔孟之道，为剥削阶级培养忠顺的奴才和接班人，维护封建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害人经。全书浸透了儒家反动思想的毒汁，散发着没落地主阶级腐朽世界观的臭气。

《三字经》用三字一句的顺口溜的形式，宣扬极其反动的内容，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赞赏和推崇。明清以来，几经修订、增补和注释，大量印行，并刊印满汉文、蒙汉文等对照的版本。帝国主义分子也多次将其译成英、法、拉丁等文出版。因此，流传极广，流毒很深。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普及和深入，把《三字经》拿出来彻底批判，并肃清其流毒，是十分必要的。

《三字经》的出笼是没落地主 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三字经》大致是宋末或者元初出笼的。它的出笼，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是对法家进步思想的反扑，是反动统治阶级为培养本阶级的奴才和接班人，毒害群众，加强反革命思想统治的需要。

• 1 •

北宋初，宋太祖赵匡胤在五代十国割据混战之后，积极推行一条统一的路线，经过十几年的战争，终于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当时，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等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豪强大地主阶级利用政治特权加紧剥削，大搞兼并。赵家君臣南渡偏安以后，兼并愈演愈烈，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都沦为官私佃户。残酷的剥削必然引起激烈的反抗。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起义农民“不事神佛祖宗”、“无视君臣上下”，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口号，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等级制度，指向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反动“理学”。

在农民的革命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地主阶级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尊儒反法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尤其到了南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那帮大地主、大官僚、孔孟的忠实信徒，为了镇压农民运动，为了扼杀法家的进步思想，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宣扬孔孟之道。他们一方面大量注释儒家“经典”，把孔孟黑货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他拼命地抬高孔老二，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提出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以对抗农民运动的“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他精心炮制了《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统称《四书章句集注》）等黑书，根据南宋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重新做统一解说工作，进一步发挥和阐明孔家店的复辟倒退的政治纲领和道德信条。另一方面，大量编纂尊儒反法的“启蒙”读本。朱熹自己就编写了《小学》、《训蒙诗百首》等等。此后，类似的黑书纷纷出

笼，流毒极广。相传为王应麟所编的《三字经》正是儒家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到了明清，封建王朝进而把《四书章句集注》规定为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标准答案，《三字经》也成为通行全国的蒙学课本，清王朝还把《三字经》规定为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强化其反动的政治统治。

《三字经》的要害是用孔孟之道

毒害人民，维护反动统治

“三字经，通人心”。“三字编成便学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句句知诠释，子史经书一贯通”。这两句话，从反面道出了《三字经》要用孔孟之道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毒害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要害。

《三字经》从一开头，就贩卖剥削阶级的人性论；并从人性论出发，论证反动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去培养继承人、“教化”群众的必要性，论证尊孔读经是维护“人类本性”的需要。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从孔丘的“仁者人也”，孟轲的“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那里搬来的。孔家店的头头说“人性仁”，“人性善”，“克己复礼为仁”，施行“仁政”为善，据此以攻击奴隶造反为“不仁”，污蔑法家的法治路线为“不善”，为复辟奴隶制大造反革命舆论。《三字经》重弹这种“性善论”的老调，是要给南宋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掠夺、尊儒反法以及绞杀农民革命运动的罪行涂上一层“善”的油彩。一句话，力图证明剥削制度符合“人类本性”，用“善”的靡靡之音去麻醉人民，用“善”的烟幕去掩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这就是孔家店“性善论”的真

谛。叛徒、卖国贼林彪对此心领神会，他一方面把儒家的“爱人”、“惟善为宝”之类的黑话，辑录在“四书集句”里，侈谈什么“仁爱之心”、“长者之道”；另一方面却磨刀霍霍，阴谋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下毒手，彻底暴露了他伪善的反革命嘴脸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则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性迁”的问题。所谓“性迁”，包含着极其反动的阶级内容。孔丘说什么“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孟轲也说什么“仁心”、“善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孔孟和他们的信徒，都把反动统治阶级说成是“善”的本性的体现者、保持者，而劳动人民则根本不具备善性。这是“天命”决定的，不可改变的。这样，就把人性论与天命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三字经》从这种“性迁”说引出了一个“教”字。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教，就是强行灌输孔孟之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反革命专政。所谓“教之道，贵以专”，专就专在只能灌输孔孟之道，只能以儒家的反动学说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这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翻版。

《三字经》在进行尊孔读经的反动说教时，把孔孟的孝悌之道提到了首位，即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孝悌观念，历来是一种政治概念，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在殷周，孝悌直接为维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奴隶宗法制度，巩固奴隶主专政服务。到了春秋战国，孔丘之流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孟轲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把提倡孝悌与反对奴隶造反、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夺权、维护奴隶制联系起来。《三字经》挥舞这面破旗，是为了抵制广大农民群众起来造反，也是为了抵制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革新口号的影响，

为地主阶级顽固派效劳。刘少奇和林彪，也是“孝悌”的吹鼓手。一个说什么“要做一个好党员”必须首先“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一个则把“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反动教条奉为座右铭。他们都想借行孝悌之“道”，以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

《三字经》竭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大肆宣扬“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从孔老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教中引伸出来的。“三纲”，是剥削阶级确立的统治秩序；“五常”，则是维护、实现“三纲”的道德教条。《三字经》根据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谬论出发，给“三纲五常”戴上了神圣的光圈。它胡诌什么“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又说什么“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里，《三字经》的作者用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搅在一起，在“三”、“五”这些数字上穿凿附会，大做文章，其目的是要证明天上的“三光”与世上的“三纲”，自然界的“五行”与人间的“五常”都是神的安排，是天经地义、不容紊乱的，而合乎“三纲五常”的剥削制度是“顺天”的，“有理”的，冲决“三纲五常”罗网的任何造反行动，则是“逆天”的，“有罪”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逻辑。

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中，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以政权为基干的，因此，“三纲五常”是以“忠君”为核心的。忠君思想，不仅是封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而且是法律上的量刑标准，谁违背了这个信条，就是大逆无道。《三字经》的作者打着“考世系，知终始”的幌子，贩卖的正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儒家正统思想。他把中国的历史，描绘成为一部帝王的家谱史，抹煞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毛主席教导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作者却把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污蔑为“寇如林”，从根本上否定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就暴露了《三字经》宣扬的是反动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用“天命论”来解说王朝更替的历史现象。他以“载治乱，知兴衰”为标榜，颂扬尧舜时代为“盛世”，咒骂春秋战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为“王纲坠”、“逞干戈”的“乱世”，而以后的一些朝代，更是“失统绪”，一代不如一代。这种厚古薄今的唯心史观，说明《三字经》用以毒害人民的说教，正是儒家的倒退经、复辟经。

林彪一伙，出于篡党窃国的需要，说什么“三纲五常”可以“统一人民的思想”。他特别把封建世袭、“忠君”思想奉为至宝，要他的死党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精神，去为建立封建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卖命。但是封建世袭制度，早已被革命人民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林彪要开历史的倒车，到头来只能是彻底破产，被历史所嘲弄。

《三字经》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奴仆，用孔孟之道毒害人民，在神化“三纲五常”的同时，大肆吹捧儒家“经典”。什么“论语者，……记善言”，什么“孟子者，……讲道德，说仁义”。其实，这两本孔孟的言行录，黑话连篇，毒汁四溅，记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复辟狂的言行，讲的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道德仁义。《三字经》的作者把“四书五经”说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其实，反动派的“修、齐、治、平”就是劳动人民的灾难。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实践证明：儒家“经典”是反动派上台时的“统治经”，垮台后的“复辟经”；是阴谋家的“权术经”；是巧

伪人的“修养经”；是叛徒、卖国贼的“卖国经”。《三字经》拼命美化抬高儒家“经典”，特别是把《论语》放在第一位大吹大擂，正是反映了反动统治阶级企图从尊孔读经中寻找出路的迫切要求。

《三字经》为了说明这些经书人人必读、妙用无穷，竟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罗列了十几个样板要人们效法。

打头的第一个黑样板是孔丘。“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硬是把孔家店的大老板说得“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其实，这个骗子的“圣贤”名声，完全是历代的反动派捧起来的，这个“秕糠”的“勤学”的故事，也是其徒弟徒孙捏造出来的。谁都知道，孔老二是学周礼，为复辟，表彰他的所谓“勤学”精神，就是表彰反革命。林彪极力鼓吹要学习孔老二所谓“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这和《三字经》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

接着抬出来的，是一连串孔孟的“高徒”。翻来复去唱的都是孔孟之道的赞歌，目的是要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成为孔家店的传道士，做封建王朝的忠实奴仆。

《三字经》大讲关于“神童”的神话，更是赤裸裸地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毛主席教导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三字经》狂热吹捧这些不同于“凡胎俗骨”的“天才”，其目的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论：“芸芸众生”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林彪从孔家店的破烂武库中捡起了“天才论”作为他反党的理论纲领，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脑袋瓜“特别灵”，是“受命于天”的“天才”、“超天才”，目的也正是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三字经》还着力渲染了一些靠“发愤读经”做了大官的所谓“贫家子弟”，妄图以此向人们证明：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

不是社会制度不好，而是自己“不刻苦”、“不上进”。只要“发愤读经”，就可以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这是一个大骗局。革命人民懂得：一个人的向上爬和一个阶级的解放，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象路温舒、朱买臣那样的比较贫困的人，沿着“读经做官”的路子爬进了达官显贵的行列，毕竟是例外的少数。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剥削阶级收买奴才、搞政治欺骗的需要。他们当了官，只能成为剥削阶级的帮凶和装饰品，决不能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表。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条件上学读书？鼓吹什么劳动者应该“读经以求解放”，纯属愚弄群众。何况孔孟的经书正是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很明显，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决不是靠读经，而是靠组织起来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靠革命。

刘少奇和林彪一贯鼓吹“读书做官”论。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要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闭门“修养”，死啃书本，脱离斗争，脱离革命，为他们推行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服务。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变本加厉地贩卖这种货色，毒害人民，妄图引诱青年脱离工农群众，脱离三大革命实践，成为精神贵族，充当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三字经》以“教子读经”、“学而优则仕”作为全书的归结，说明它把“剥削传家”与“读经继世”完全结合起来。它一会儿装成一副循循善诱的面孔，唱着“尔小生，宜立志”，“尔勤学，勉而致”的调调，诱惑青少年立志攻读孔孟经书，要他们“幼而学，壮而行”，也就是从小就把孔家店的剥削之道、压迫之道、复辟之道学到手，长大就身体力行。“上致君”，对上忠于封建帝王，替反动统治阶级效劳；“下泽民”，对下愚弄人民群众，使他们安心当牛做马。这样就可以“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一会儿又

摆出教师爷的架势，说什么“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穷凶极恶地咒骂不读孔孟经书的人，违背了做人的根本，连鸡狗都不如。引诱也罢，咒骂也罢，都是为了培养信徒、网罗奴才，实现“读经继世”的反革命迷梦。《三字经》还特别告诫剥削阶级，切莫满足于“遗子”“金满籝”，务必做到“教子”“唯一经”。这帮孔孟的忠实信徒深深地感到：他们的剥削“事业”要代代相传，只从物质上考虑，把金银财宝留给子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持思想阵地，传“剥削经”，所以他们把“四书五经”看作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传家宝”。林彪“教子读经”，正是为了给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传宗接代，充分暴露了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和影响，批判孔孟之道，肃清其流毒，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三字经》被抛进垃圾堆是历史的必然

长期以来，《三字经》博得了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的片喝采声：什么“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什么“袖里通鉴纲目”、“小型百科全书”。而劳动人民对《三字经》则是极其蔑视的，他们从自己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孔孟之道是害人道，《三字经》是害人经。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中就流传着象“人之初，鼻涕拖”之类的嘲弄《三字经》的笑话。

特别是在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群众对孔孟的偶像、经书，以及《三字经》之类的黑货，更是毫不客气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基础——孔孟之道。革命农民在斗争中宣判孔老二为“妖人”，砸烂孔老二的牌位，宣布孔孟经书为“妖书”，焚毁儒家经典，严禁孔学流传。太平天国还针锋相对地编写并颁行了太平官书《三字经》。太平天国的《三字经》，揭露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人世间罪恶的根源；痛斥封建统治者残害人民的“蛇魔”；欢呼革命农民战胜“妖魔”的造反精神；热情地颂扬了革命农民“散邪谋”、“审判世”的显赫权威。太平天国的革命的《三字经》是对孔家店反革命的《三字经》的有力批判，它宣告了反动派用孔孟之道扼杀革命的迷梦的破产。

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文化新军，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的两面大旗，向孔家店发动了新的进攻。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无产阶级新文化在斗争中的发展，儒家经典以及《三字经》之类的坏书越来越没有市场。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贼心不死，千方百计提倡尊孔读经，多次修改和印行《三字经》，借孔孟的亡灵，大造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舆论。但曾几何时，蒋家王朝被人民的革命铁拳砸得粉碎，《三字经》也同反动派一起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又从古墓

陈棺里抬出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从垃圾堆里捡起儒家的经书，猖狂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们是混进党内的大儒。一九六二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大合唱，第三次抛出了他的浸透了孔孟毒素的黑《修养》。臭名昭著的“三家村”也疯狂叫嚣“《三字经》是本好书，可惜已经被冷落了几十年”，公开声称要“继承”“这份遗产”。复辟狂林彪，更是把儒家经书看作“宝贝”，作为他复辟倒退、投敌卖国的思想武器。但是，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儒家的经典挽救不了奴隶制的崩溃，挽救不了南宋王朝的垮台，同样也挽救不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必然覆灭的命运。

从《三字经》炮制和流传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宣传孔孟之道是无孔不入的，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使用各种手段把毒素扩散到各个角落。“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列宁选集》第3卷，第390页）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

《三字经》批注

北京大学 翟仲史 群

【原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①。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②。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③。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注释】

① 初：初生。性：本性。前句取孟轲的“性善论”，见《孟子·滕文公上》篇。后句见《论语·阳货》篇。意思是说人之初生本性是善良的，彼此相近的，因影响不同，则产生善恶的差别。但孔丘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的君子本性善良，“下愚”的小人本性恶劣，即奴隶主性善，奴隶性恶，二者不变。只是介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人，本性才可随环境而起变化。可见孔孟之流的“性善论”，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是为维护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血腥统治服务的。

② 昔：过去。择邻处：选择邻居而处。据说孟轲年幼父亲早死，孟母为了把他培养成孔老二的信徒，曾三次搬家。最初住在坟地旁边，孟轲便学做丧事，孟母觉得不好。又迁到一个屠户的旁边，孟轲又模仿屠宰，孟母认为没有出息。最后搬到一个学舍附近，孟轲就学习儒生们行礼读经，孟母很高兴，从此就定居下来。断机杼：机杼（音 zhù 柱），织机的梭子。据说孟轲不肯勤学，一次逃学回来，孟母一怒之下，把织布机的线剪断，借此教育孟轲：不读书，就象布机断线一样，布就织不成了。孟母三迁和断线教子，其目的是为了把孟轲培养成孔老二“克己复礼”反革命事业的继承人。

③ 窦燕山：名禹钧，五代时后周人，是一个恶霸地主。他用孔孟之道教育儿子，后来五个儿子都做了宋朝的大官，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

【批判】《三字经》开宗明义，捧出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剥削阶级的人性论。因为这是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

孔丘说“性相近也”。孟轲赤裸裸地鼓吹“性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三字经》的开台锣鼓鼓吹的就是剥削阶级的“人性论”。

又讲“性本善”，又讲“习相远”，乍一看好象矛盾，其实自有其反动的逻辑。孔孟都鼓吹一种先天的、抽象的“本性”。那么，为什么还要讲“习相远”呢？这是为了灌输孔孟之道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证明：只有反动统治阶级才能保存和发扬“善性”，居于统治地位；而劳动人民则完全丧失了“善”性，应该被统治。“性善论”是替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作论证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所谓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至于善恶问题，它从来就是一种历史的、阶级的概念。封建制对奴隶制，资本主义对封建制来说都是一种进步，当它在上升时期是革命的、前进的，但随着它的对立面的壮大，并同它进行斗争，它就变成腐朽的、没落的了。对资产阶级是善的，无产阶级一定要反对它，打倒它。根本没有超历史、超阶级的善恶。

“性善论”是极端虚伪的，它是反动派杀人的软刀子。孔丘、孟轲用它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主、资本家用它来残酷地压榨农民和工人。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在“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幌子下侵略中国的吗？蒋介石、汪精卫不是在“性善论”的